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

唐　静，王竹青，许陈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以 2003～2018 年 126 个国家（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为样本，重点考察了双边教育协定这一制度因素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实证表明，双边教育协议对对象国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影响比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影响更显著，并能够有效缓解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阻碍作用。基于此，更好地依托双边教育协定与学历互认等措施，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双边教育协定；来华留学；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52.68：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1)01-0032-16

DOI:10.13509/j.cnki.ib.2021.01.003

引　言

近年来，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教育服务贸易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教育服务贸易，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无论是对于一国软实力提高、吸引优秀人才，还是对于创造外汇、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发达国家吸收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方式，我国日益重视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已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尽管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现实没有扭

[收稿日期] 2019-03-29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视角下政治基因对企业寻租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2016A03031035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层政治外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境外安全的影响研究”（2016A030313687）；广东省科技创新培训项目“此心安处是吾乡——来华留学生的华文化认同分析”（pdjh2020b0213）。

[作者简介] 唐静（1979～），女，湖北荆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服务贸易；王竹青（1997～），女，广东东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许陈生（1977～），男，江西会昌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转，特别是与主要教育服务输出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王立勇等，2019），与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教育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如何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全面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来华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已有许多文献对影响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因素和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刘扬等，2013；宋华盛和刘莉，2014；吕娜，2015；林航等，2016），但大多未注意到双边教育协定的重要潜在作用。相对于经济等宏观因素的考量，海外留学生选择来华可能更容易受到国际贸易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因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选择来华的意愿。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贸易国家通过国际制度的构建，有助于解决国际间信息不对称和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双边教育协定可以通过促进国家间信息传输，形成对留学贸易的预期，抵制外部性的发生，保障国际间的教育合作，从而提升教育服务贸易的质量与规模。深化落实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使命。基于此，本文试图定量考察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影响，从而为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制定政策、探索有益路径提供实证支持。

一、文献综述

从总体来看，最初关于留学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以构建引力模型、“推动-拉动”模型等为主。有学者通过引力模型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发展潜力、科技与教育水平、双边的贸易关系、学历互认协议等因素对留学生来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华盛和刘莉，2014）；也有学者进一步发现留学生的数量与国家的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相关（Chen & Barnett，2000）。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留学生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强调了两国社会之间语言、文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Mazzarol & Soutar，2002；Nicolas et al.，2003）。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因素逐渐被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已有文献就双边教育协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因素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发现是否签署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协议对扩大来华留学人数的作用显著（姚海棠和姚想想，2013；魏浩等，2018；陈飞宇，2018），尤其是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和话语权重构的背景下，国际制度理论的倡导者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经济行为的分析，并有学者开始从国际劳动力视角研究留学服务贸易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效应的影响机制（魏浩和连慧君，2020）。

双边教育协定是指双边国家或地区在教育政策沟通、平台与机制以及合作实践等方面做出的协议。WTO 的成员通过签订双边和次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魏艳茹，2008）来弥补《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框架下的不足。我国通过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形式为我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夯实了社会与民意基础，教育国际合作得到实质性推进。特别针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撑”的定位，我国在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共建丝路合作机制方面展开了多种形式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合作，从签约内容的合作程度来看，双边教育协定可以分为文化合作协议、合作谅解备忘录、教育合作协议和学位互认协定四大类（见表 1）。

表 1　双边教育协定的四种类别

类别	有效性	合作性	定义
文化合作协议	弱	弱	把教育作为一部分所签订的非专项教育条约
合作谅解备忘录	较弱	较弱	关于双方教育合作和协议签订工作的书面声明
教育合作协议	较强	较强	因具体教育合作要求所达成的教育专项条约
学位互认协定	强	强	国家间相互承认证书、学位和职称等的协议

资料来源：作者手动整理。

综观相关文献，虽有证据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孔子学院、领导人出访等（谢孟军，2017；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能够起到显著的贸易推动作用，但从正式制度的视角来考察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所具有的重要潜在作用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缺乏对于双边教育协定的进一步归纳和分类，也忽略了双边教育协定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距离国家、不同的生源地国家影响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质量。

事实上，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需要东道国政府的配合，更需要母国政府的积极推动。特别是，中国如果要进一步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政府更加需要加大服务供给，吸引国际优质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输入。

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丰富和拓展：一是基于双边、多边协调视角搜集最新数据资料展开实证研究，考察目前的教育协定的变迁，根据教育协定的异质性进行界定和赋值分析；二是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和新经济制度理论，检验不同的文化距离国家（地区）双边教育协定与来华留学规模的关系；三是依据不同生源国（地区）的差异，实证考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和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不同双边教育服务协定对来华留学规模的影响，以识别影响中国双边教育政策协调机制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二、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

根据引力模型来看，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引力作用上，即是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动力之一，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边教育协定通过信号机制和承诺机制引发留学生来华学习就业的动机

海外留学生会因为自身的经历、价值理念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留学动机，最终做出的选择也可能大相径庭。部分学生会在留学生奖学金等目的国政府激励政策的促进下出国深造，有些学生则看重留学声誉，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来寻求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拓宽未来的发展空间（陆菁等，2019）。一般来说，留学生对自身留学受到保护的信心越大，其留学动机越容易被激发，从而采取留学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安排作为一种信号和承诺机制可以增加承诺的可信性（邓富华等，2019）。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教育协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通过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信号机制和承诺机制引发留学生来华学习就业的动机。一方面，双边教育协定以明确的制度措施向签约国释放积极的教育合作“信号”，增加两国保护来华留学生权益的可置信承诺，减少了可能由于不健全制度所形成的“坏声誉”，通过信号机制加强留学生来华的信心，促进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双边教育协定作为两国间条约，使留学生的来华活动制度化及合法化，通过提高违约成本等方式来发挥承诺机制，让留学生确信其来华动机的实现能够得到制度保护，从而激发留学生来华意愿，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

（二）双边教育协定通过降低来华留学的成本和风险为留学生来华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在众多影响来华留学规模的因素中，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姚海棠和姚想想，2013）。从服务品的角度来看，来华留学本身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即留学生在出国留学时，通常不能提前感知其服务，因此服务品的提供方与选择方之间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胡超和张捷，2011）。这会提高留学生把握信息的难度，进而增加留学生在信息获取等过程中的成本，并加大留学生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降低留学的成本和风险，海外留学生更倾向于到政治稳定、制度完善和有明确政策支持的目的国求学。一方面，虽然两国间存在差异，但双边教育协定的详细制度条款能帮助留学生去了解这些差异，以制度形式减少留学生因此而花费的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双边教育协定作为教育国际条约，是为教育活动建立依据并促使它们合法有序开展的一套国家间的契约安排，其签署意味着缔约国之间教育主权的部分让渡（栗晓红，2014），可通过契约效力保证留学生的相对安全，降低留学生对来华求学的风险预期，为留学生来华提供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从而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

（三）双边教育协定确定了教育服务的可贸易属性，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发展有促进作用

作为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制度，GATS 于 1995 年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其承认了教育活动具有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既定规则以服务贸易形式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属性（张建林和郑春芳，2010）。但该框架下的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尚未满足现实要求，因此有很多 WTO 的成员开始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魏艳茹，2008）。一方面，双边教育协定作为补充 GATS 不足的条款，为签订国之间的教育活动开展规定了其所应该遵循的法律规范框架，能降低法律门槛，维护教育合作关系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打开了两国教育市场，促进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很多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教育资源仍处于劣势状态，教育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中面临着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制度理论认为，政治、教育和价值观等各方面制度的不同，会使国家之间的整体制度环境产生差异。而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当今不同国家（或地区）产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差异的重要原因（胡超和张捷，2011）。双边教育协定作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教育合作相关政策，能进一步清除双边服务贸易往来的政策壁垒，为双边高等教育合作搭建桥梁，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促进双边教育的互补协作和资源共享，推动中国的教育资源质量由低端向高端发展，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吸引留学生来华，扩大中国教育服务出口。

根据前文所述，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可能会增加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人数。其中，中国教育部以是否接受学历教育将来华留学生分为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两大类。已有研究发现，对学历生而言，影响其跨国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对留学院校影响自身未来发展程度的判断（郭立强，2019）。双边教育协定尤其是学历互认协定属于国际条约法的范畴，从政府层面提供了基础的法律保证，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马杰，2014），是来华留学教育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学历学位互认对留学生流动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李小红和方晓田，2018），其签署可为学历生所攻读的学历学位质量提供制度保障，提高学历生对留学院校如何影响自身未来发展的良性判断，通过承诺机制引发学历生来华学习的动机。因此笔者推测，双边教育协定对学历生和非学历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后者作用更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 2: 与非学历生相比，双边教育协定更能促进学历生来华留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在参考《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各生源国（地区）与中国的留学关系以及各大洲兼顾的原则，最终选取出的样本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老挝、日本、哈萨克斯坦、越南、法国、蒙古国、马来西亚等五大洲 126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涵盖了来华留学人数排前 20 名的国家。研究时间段为 2003～2018 年，由于部分变量数据缺失，本文最终的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1. 被解释变量: 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已有文献的常见做法，把 2003～2018 年各经济体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衡量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该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并取对数处理。由于部分经济体数据缺失，其他数据来源于我国教育部网站的统计公报、来源国（地区）教育部网站等，通过手动整理获得。

2. 核心解释变量: 双边教育协定（*Agree*）

双边教育协定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参照贺书锋和郭羽诞（2009）通过赋值法来确定政治因素的研究，根据签约内容的合作程度将双边教育协定进行赋值，具体情况为: 学位互认协定赋值为 4、教育合作协议赋值为 3、合作谅解备忘录赋值为 2、文化合作协议赋值为 1、无教育交流赋值为 0。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等网站。

3. 控制变量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nofdi*）。现有研究发现，双边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潜力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的重要影响因素（宋华盛和刘莉，2014）。中国对各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源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力度越大，越能显示出双方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也越有利于向生源国（地区）展示出中国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从而吸引大量来华留学生。因此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该国（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成正向关系。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取对数处理。

（2）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Lngdpp*）。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能有效反映该国（地区）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越高，该国（地区）留学生越有能力承担起来华留学的相关成本，越有动力实现来华留学的潜在意愿，该变量对来华留学生人数表现为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越高，该国（地区）留学生来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该变量对来华留学生人数表现为抑制作用（林航等，2016）。因此预测，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与该国（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并取对数处理。

（3）生源国（地区）人口数（*Lnpop*）。人口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教育需求多样性和该国来华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指标。从理论上来看，生源国（地区）人口越多，该国（地区）居民接受教育的需求越强，其潜在来华留学生群体越大（林航等，2016）。因此预测，生源国（地区）人口数与该国（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成正向关系。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并取对数处理。

（4）双边政治关系（*Dip*）。国际间人才流动的数量与各国政治因素有关（Chen & Barnett，2000）。与中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好的生源国，该国留学生对中国的认识越深，越容易对中国产生认同感，也会更有意愿来华留学。因此预测，双边政治关系与该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成正向关系。参照贺书锋和郭羽诞（2009）的方法，采用赋值法来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量化，具体情况为：战略合作伙伴赋值为 5、战略性合作关系赋值为 4.5、全面友好合作伙伴赋值为 3.5、全面合作伙伴赋值为 3、友好合作伙伴或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赋值为 2、正常建交国家赋值为 1、未建交国家赋值为 0。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新华网等网站。

表 2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Lnstu*	来华留学生人数取对数	各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等
核心解释变量	*Agree*	双边教育协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等网站①
控制变量	*Lnofd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	各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Lngdpp	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取对数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②
	Lnpop	生源国（地区）人口数取对数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Dip	双边政治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③、新华网④
	Fcity	友好城市数量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⑤

①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网址：http://www.cdgdc.edu.cn/；访问日期2019-01-03。

②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访问日期2019-01-03。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网址：https://www.fmprc.gov.cn/web/；访问日期2019-01-03。

④ 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19-01-03。

⑤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网址：http://www.cifca.org.cn/；访问日期2019-01-03。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5）友好城市数量（*Fcity*）。作为城市外交的重要部分，友好城市之间的交往是综合而全面的，能够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促进教育往来（刘铁娃，2017）。一般来说，友好城市数量的增多有利于加深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本身的了解，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留学生来华的推动力。因此预测，友好城市与该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成正向关系。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等网站。

（二）基本模型

由于留学生选择的目的国只有中国，因此所设定的模型只包含与生源国（地区）相关的特征变量。根据研究假设，把模型构建为如下方程：

$$Ln(STU_{it}) = \beta_0 + \beta_1 AGREE_{it} + \beta_2 Ln(OFDI_{it}) + \beta_3 Ln(GDPP_{it}) + \beta_4 Ln(POP_{it}) + \beta_5 dIP_{it} + \beta_6 FCITY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下标 i 和下标 t 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STU_{it} 为在 t 年从 i 国（地区）到中国的来华留学生人数；*AGREE* 为两国（地区）双边教育协定的赋值程度；*OFDI* 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GDPP* 为生源国（地区）的人均 *GDP*；*POP* 为生源国（地区）的人口数；*DIP* 为两国（地区）双边政治关系的赋值程度；*FCITY* 为两国（地区）之间的友好城市数量；β_0 为常数项；ε_{it} 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描述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所示。从因变量来看，衡量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 *Lnstu* 指标均值为 5.900，标准差为 1.93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693 和 11.164，这说明各样本国（地区）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差距较大。从自变量来看，衡量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程度的 *Agree* 指标均值为 2.587，标准差为 1.29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1 和 4，这说明我国与各样本国（地区）签署的双边教育协定存在差异。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Lnstu	1 984	5.900	1.936	0.693	11.164	5.862
Agree	1 952	2.587	1.295	1.000	4.000	3.000
Lnofdi	1 788	9.020	2.703	0.000	15.723	9.387
Lngdpp	1 982	8.640	1.509	5.251	11.685	8.630
Lnpop	2 000	16.265	1.573	12.620	21.025	16.196
Dip	2 015	2.701	1.451	0.000	5.000	3.000
Fcity	1 664	16.397	35.613	0.000	248.000	4.000

注　“*”“**”和“***”分别表示符合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在判断变量显著性时出现错误结论，采用 Petersen 提出的二维聚类分析法（Cluster2）来进行分析，即对同时具有国家效应与时间效应的面板数据使用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群集标准误差以修正偏误（Petersen，2009）。此外，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遗漏解释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偏倚”问题（周念利，2012）。

表 4 中列（1）和列（2）报告了双边教育协定赋值与全体留学生的回归结果。列（1）显示，在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时，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5938，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这符合预期。但是该模型的 R^2 仅为 0.1559，解释力度不够强。因此，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2627，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假设 1”的推论相符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也是“人们有意设计并用来约束彼此相互关系的规则”（North，1990；刘晖和李嘉慧，2019）。双边教育协定作为国家（地区）所规定的正式制度，为两个经济体间的教育合作提供了规则约束，体现出了制度因素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

表 4　整体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留学生 (1)	全体留学生 (2)	学历生 (3)	非学历生 (4)
Agree	0.593 8*** (7.69)	0.262 7*** (3.58)	0.255 0*** (3.65)	0.300 5*** (3.48)
Lnofdi	—	0.353 4*** (11.56)	0.449 4*** (13.50)	0.305 1*** (9.18)
Lngdpp	—	−0.019 0 (−0.22)	−0.455 2*** (−5.69)	0.238 9** (2.50)
Lnpop	—	0.323 9*** (4.05)	0.133 7 (1.45)	0.391 2*** (4.11)
Dip	—	0.044 0 (0.85)	0.100 5* (1.75)	0.058 6 (1.05)
Fcity	—	0.010 5*** (3.60)	0.011 3*** (3.20)	0.011 0*** (3.60)
C	4.377 9*** (14.34)	−3.340 0** (−2.06)	1.363 0 (0.75)	−7.120 3*** (−3.85)
Adj-R	0.155 9	0.685 8	0.662 3	0.677 0
Observations	1 922	1 429	1 438	1 431

表 4 中列（3）和列（4）分别报告了双边教育协定赋值与学历生和非学历生的回归结果。对学历生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255 0，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对非学历生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300 5，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对非学历生的影响更大，与“假设 2”的推论相反。原因可能是：虽然我国与各样本国（地区）在双边视角下签署了教育协定以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质量保证和学历互认等事项进行完善，但从全球的多边视角来看，除了发达成员以外，其他成员的学历如果要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可，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唐海涛，2017）。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我国所面临的学历互认门槛更高，学历的国际化认可程度更低，对各经济体学历生的吸引力相对不足。因此，在加快双边教育协定签署的同时，我国也可通过与国际知名教育机构合作等方式，构建更为统一的学历互认标准，加强自身在国际教育上的话语权，为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提供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教育资源质量保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做如下稳健性检验。

1. 考察中国与各生源国（地区）签订的双边教育协定数量与来华留学规模

在前文的模型中，本文通过赋值法，根据签约内容的合作程度来对双边教育协定赋值进行检验。为了体现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性影响，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将中国与各生源国（地区）签订的双边教育协定累计数量来作为代理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模型估计效果与前文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表 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留学生 (1)	全体留学生 (2)	学历生 (3)	非学历生 (4)
Agree	0.756 1*** (3.84)	0.337 6*** (2.95)	0.260 4** (2.12)	0.456 1*** (3.51)
Lnofdi	—	0.350 2*** (11.03)	0.448 7*** (13.29)	0.299 1*** (8.65)
Lngdpp	—	−0.000 8 (−0.01)	−0.433 6*** (−5.70)	0.255 1*** (2.84)
Lnpop	—	0.371 1*** (4.58)	0.179 7* (1.92)	0.444 8*** (4.81)
Dip	—	0.081 0 (1.48)	0.140 1** (2.37)	0.097 7* (1.68)
Fcity	—	0.010 4*** (3.40)	0.011 1*** (3.12)	0.011 1*** (3.37)
C	4.953 6*** (11.40)	−4.051 1** (−2.53)	0.692 9 (0.39)	−7.949 9*** (−4.46)
Adj-R	0.048 8	0.669 4	0.646 2	0.662 8
Observations	1 922	1 429	1 438	1 431

2. 将各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前文模型验证了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考虑到该模型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故将各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来对整体面板数据进行再次回归。这样既能克服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也可以克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曲如晓等，201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回归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和符号均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回归效果与前文基本相同。

表 6　将各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留学生 (1)	全体留学生 (2)	学历生 (3)	非学历生 (4)
L. agree	0.572 9*** (7.43)	0.248 1*** (3.38)	0.247 0*** (3.64)	0.283 0*** (3.28)
L. lnofdi	—	0.333 8*** (11.66)	0.428 0*** (12.83)	0.282 2*** (9.50)
L. lngdpp	—	−0.035 5 (−0.41)	−0.459 0*** (−5.84)	0.213 9** (2.23)
L. lnpop	—	0.348 1*** (4.43)	0.159 0* (1.71)	0.414 5*** (4.45)
L. dip	—	0.031 8 (0.65)	0.091 0* (1.65)	0.052 1 (0.95)
L. fcity	—	0.009 9*** (3.47)	0.010 6*** (3.12)	0.010 5*** (3.50)
C	4.551 6*** (15.74)	−3.136 6* (−1.95)	1.450 4 (0.81)	−6.802 3*** (−3.75)
Adj-R	0.152 5	0.682 3	0.659 7	0.672 7
Observations	1 808	1 429	1 436	1 430

3. 倾向评分匹配法（PSM）

为了再次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和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根据双边教育协定的分类，将合作谅解备忘录、教育合作协议和学位互认协定作为处理组，赋值为 1，将文化合作协议和无教育交流作为控制组，赋值为 0。基于 Logit 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PS 值进行配对，最终结果参考“对被处理单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来估计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7。可以看出，处理组协定的 ATT 估计值为 0.777 5，t 值为 4.95，在 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匹配后的处理组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也从侧面表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能显著地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即前文结论相对稳健。

表 7　匹配后的平衡检验结果

因变量	变量	样本状态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标准差	T 值
Lnstu	*Agree*	匹配后	6.525 2	5.747 7	0.777 5	0.157 2	4.95***

五、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影响的异质性

已有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教育协定这一制度因素对来华留学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为了更加深入地识别这一作用的发生条件和情景，本文进一步从文化距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离、国家经济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文化距离

对文化距离不同的经济体来说，双边教育协定发生作用的结果有何不同？已有研究证明，文化距离的加大会对留学生来华产生阻碍作用（林航等，2016）。当目的国（地区）与生源国（地区）的文化距离较远时，双方的文化差异会增加留学生选择目的国（地区）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求学时融入中国文化的困难程度，进而增加留学过程中的搜寻成本、文化沟通成本等交易费用，抑制留学生来华。根据新经济制度理论，制度可以通过约束功能、激励功能以及信息功能来降低交易费用，完善合作机制和提高合作效率（李凯伦等，2019）。那么双边教育协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能否降低文化距离对于来华留学规模的阻碍作用以促进留学生来华？

为了进一步检验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发挥正向促进作用的机制，笔者将文化距离作为分组变量引入基本模型，重点考察分组之后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作用的变化情况。以中国与各生源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均值作为分组依据，将文化距离大于或等于均值的生源国（地区）定义为“远文化距离组”，反之则定义为“近文化距离组”。参照吉生保等人（2018）的方法，选取 Kogut-Singh 指数来对文化距离进行测度。该指数由 Kogut 和 Singh（1988）以 Hofstede（1984）的文化距离概念为基础，选取权利距离指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这四个维度构造得出。① 由于部分国家（地区）的文化距离数据存在缺失问题，本文最终的分组情况为：39 个“远文化距离”国（地区），37 个“近文化距离”国（地区）。

表 8 是对文化距离分组的回归结果。对“远文化距离组”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249 7，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对“近文化距离组”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231 4，其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对“远文化距离组”的留学生的影响更大，作用也更明显，即当目的国（地区）与生源国（地区）的文化距离较远时，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可见，作为有形的制度安排，双边教育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由文化距离所给留学生带来的阻碍效应，降低了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潜在壁垒，有效发挥了吸引留学生来华的作用。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契约中的明确措施来加强留学生对目的国（地区）的了解，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等形式促进两者的文化资源共享，为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创造必要条件，在教育合作的基础上降低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的困难程度。

（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的留学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的来华留学人数呈现出增

①Hofstede 网站。网址：http://gfffg04b61437862f48c0h0o0xpcvwfunw6kqx.fxyh.librra.gdufs.edu.cn；访问日期：2020-01-0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速下降、停滞或者负增长的局面，发展中经济体的来华留学人数占比增加（韩丽丽，2017）。为了识别双边教育协定对发达经济体留学生和发展中经济体留学生的影响异质性，把样本国（地区）细分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回归。

表 8　基于文化距离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远文化距离组 （1）	近文化距离组 （2）
Agree	0.249 7*** （2.77）	0.231 4 （1.38）
Lnofdi	0.196 0*** （5.12）	0.456 4*** （7.99）
Lngdpp	0.132 4 （0.77）	−0.066 2 （−0.37）
Lnpop	0.460 8*** （3.74）	0.308 5* （1.90）
Dip	−0.010 0 （−0.12）	−0.035 3 （−0.34）
Fcity	0.008 9*** （3.57）	0.022 2*** （3.84）
C	−5.375 1** （−2.33）	−3.471 1 （−1.06）
Adj-R	0.730 9	0.717 3
Observations	541	452

表 9 中列（1）和列（2）分别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子样本进行了估算。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在这两个模型中去掉了生源国（地区）人均 gdp 这个控制变量。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163 8，且在 10%的显著水平上；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293 5，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留学生的影响更大，作用也更明显，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双边教育协定更能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学生来华留学。由于本国（地区）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当发展中经济体学生选择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留学时，会倾向于考虑出国的难易程度和毕业的难易程度（魏浩等，2012）。双边教育协定通过制度形式提高了留学生来华求学和留学后就业的便利化程度，对发展中经济体学生来华的激励作用更强。此外，较之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加强了对中国教育资源的质量保障程度，对发展中经济体留学生的吸引力比发达经济体留学生更大。

（三）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因为地理优势和政策保障等原因，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逐渐成为新的来华留学增长点。2018 年，在排名前 15 的来华留学生来源国（地区）中，有 11 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①。据统计，在来华留学人数增长最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网址：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访问日期 2020-01-0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快的国家（地区）中，泰国、老挝、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数量增幅平均超过 20%（徐小洲，2019）。为了识别双边教育协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留学生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留学生的影响异质性，本文把样本国（地区）细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来进行回归。

表 9　分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程度		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1)	发展中经济体 (2)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3)	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4)
Agree	0.163 8* (1.66)	0.293 5*** (3.68)	0.194 5* (1.81)	0.117 0 (1.33)
Lnofdi	0.239 1*** (5.27)	0.418 3*** (10.68)	0.416 8*** (9.07)	0.313 1*** (7.71)
Lngdpp	—	—	−0.210 6* (−1.72)	0.252 0*** (2.70)
Lnpop	0.317 3*** (2.90)	0.340 0*** (4.62)	0.339 7*** (4.07)	0.326 4*** (3.52)
Dip	0.120 2* (1.84)	−0.012 4 (−0.20)	0.118 3* (1.69)	−0.098 2 (−1.29)
Fcity	0.009 8*** (3.73)	0.001 3 (0.08)	−0.000 3 (−0.02)	0.010 5*** (2.97)
C	−1.889 0 (−1.16)	−4.306 3*** (−3.79)	−2.262 0 (−1.21)	−4.835 2*** (−2.62)
Adj-R	0.812 1	0.636 9	0.727 6	0.740 5
Observations	368	1 074	589	840

表 9 中列（3）和列（4）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和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子样本进行估算。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194 5，且在 10%的显著水平上；对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而言，双边教育协定赋值的回归系数为 0.117 0，且其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留学生影响更大，作用也更明显，即与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相比，双边教育协定更能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学生来华留学。在实践中，随着双边教育协定的深入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以“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为例来说明。截止到 2018 年年底，中国已与 25 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签署了 28 项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 41 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签订了 95 份教育交流与合作协定（李和章等，2019）。除此之外，教育部在 2016 年提出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在未来 5 年内每年资助 1 万名“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学生来华留学（张瑞冬，2018）。以此为背景，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经济体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了 26.06 万人，占总人数的 52.95%，已超过一半①。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教育交流和合作协议以及奖学金制度都是双边教育协定的一部分内容。结

①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 年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2 万名留学生来华留学。网址：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92742.htm；访问日期 2020-01-0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合现实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推动政治互信的形成，促使中国与各沿线经济体建立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促进双边各种规则的创造与完善。中国与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都有着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这会促使两国（地区）政府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教育合作，从而加快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和作用发挥。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增加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强化双边教育协定的正向信号机制，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一定的保障，有效提高留学生选择来华的机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笔者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双边教育协定的签署有利于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促进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发展。（2）与学历生相比，双边教育协定更能促进非学历生来华留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学历学位的国际化认可程度较低，对学历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3）双边教育协定能够有效缓解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生的阻碍作用，从而扩大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4）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有明显的国别异质性。具体而言，双边教育协定对发展中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留学生影响更为显著。

（二）建议

（1）优化政策环境，推进中国积极签署双边教育协定，实现教育合作的规范化和法定化。要从更加体系化和国际化的角度来落实学历互认事项，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以扩大自身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提升中国高校学历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和知名度，鼓励更多留学生来华选择学历教育。此外，要构建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加强对协定落实工作的监督力度，使各部门明确职责，共同确保双边教育协定在来华留学服务贸易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注重文化因素对留学生来华的影响，在协定谈判中根据双边实际情况来制定具体条例，为双边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搭建平台和提供保障，增强双边间的文化联系，从而减轻文化距离带来的阻碍效应，使双边教育协定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3）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及时抓住中国与各沿线经济体双边政治关系不断改善的机会，主动与更多沿线经济体开展高层外交活动，为双边教育协定的继续签署和完善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4）发挥高校和来华留学生的作用，共同提高教育质量。引进优秀的国际化教育资源，为来华留学教育提供质量保障，进一步推动中国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水平。系统谋划和推进来华留学服务改革事项，是积极推荐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实践议题，也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学术问题。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陈飞宇．我国与“一带一路”区域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问题研究［J］.理论学刊，2018(6)：73-80.
[2] 邓富华，贺歌，姜玉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2)：43-58
[3] 郭立强．高校国际学术人才吸引策略研究［J］.科学管理究，2019，37(6)：124-130.
[4] 韩丽丽．如何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竞争力——基于规模总量和学历结构视角的经验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8-30.
[5] 贺书锋，郭羽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J］.上海经济研究，2009(3)：3-10.
[6] 胡超，张捷．制度环境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11(2)：46-60.
[7] 吉生保，李书慧，马淑娟．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8(1)：98-111.
[8] 李和章，林松月，刘进．70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5)：79-88.
[9] 李凯伦，李瑞萍，温焜．文化距离与友好城市关系对中国版权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9，39(1)：100-103.
[10] 栗晓红．主权视野下的教育国际条约分析［J］.药学教育，2014，30(3)：1-6.
[11] 李小红，方晓田．近十年高等教育之来华留学教育：成绩与挑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4)：58-64.
[12] 林航，谢志忠，郑瑞云．孔子学院是否促进了海外学生来华留学——基于 40 个国家 2004～2014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5)：52-65.
[13] 刘晖，李嘉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型［J］.教育研究，2019，40(11)：100-110.
[14] 刘铁娃．国际友好城市文化交流与国家软实力提升［J］.对外传播，2017(10)：51-53.
[15] 刘扬，王慧，孔繁盛．外国学生缘何留学中国——基于北京高校调查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5)：32-38.
[16] 陆菁，凌慧，潘修扬．全面开放格局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高等教育服务出口与留学生来华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9(1)：22-27.
[17] 吕娜．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现状、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5(22)：98-104.
[18] 马杰．中外学位学历互认协议的法律性质、效能及发展趋势［J］.时代法学，2014，12(4)：117-121.
[19] 曲如晓，李婧，杨修．文化认同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J］.经济经纬，2016，33(3)：48-53.
[20] 宋华盛，刘莉．外国学生缘何来华留学——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11)：31-38.
[21] 唐海涛．多边视角下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法律壁垒与解决途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89.
[22] 王立勇，马光明，王桐．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七十年：成就、经验与未来发展对策［J］.国际贸易，2019(11)：4-11.
[23] 魏浩，王宸，毛日昇．国际间人才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2(1)：33-45.
[24] 魏浩，袁然，赖德胜．中国吸引留学生来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与全球 172 个国家双边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8，39(11)：76-90.
[25] 魏浩，连慧君．国际劳动力流入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4)：1-16.
[26] 魏艳茹．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高等教育服务的国际法规制［J］.学术交流，2008(7)：75-77.
[27] 谢孟军．中华文化“走出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1)：32-46.
[28] 徐小洲．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就、机遇与战略构想［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5)：1-9.
[29] 闫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2019，42(2)：147-169.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0] 姚海棠,姚想想. 来华留学生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商业,2013(14):255-257.
[31] 张建林,郑春芳. 跨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10,13(3):13-17.
[32] 张瑞冬.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留学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18(5):81-84.
[33] 周念利. 缔结"区域贸易安排"能否有效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J].世界经济,2012,35(11):88-111.
[34] CHEN T, BARNETT G A.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low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 network analysis of 1985, 1989 and 1995[J]. Higher Education,2000(39):435~453.
[35] HOFSTEDE G. Cultural dimensions i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4(1): 81-99.
[36] KOGUT B,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411-432.
[37] MAZZAROL T W,SOUTAR G N. Push-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2002(16):82~90.
[38] NICOLAS R,PAUL Y V,MARIUS T. Attracting foreign students: the case of two universities in québec[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 al Education, 2003(7):241~252.
[39]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 PETERSEN M A. Estimating standard errors in finance panel data sets: comparing approach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 22(1): 435-480.

(责任编辑　武　齐)

The Influence of Bilateral Educational Agreements on the Scale of Service Trade of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TANG Jing, WANG Zhuqing, XU Chen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aking the overseas student volume in China from 126 countries during 2003 to 2018 as a s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bilateral educational agreements on the scale of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in which the impact o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rest countries, and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bstacle of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caused by cultural distance. Based on that, it infers that the bilateral educational agreements, mutual authentic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will reinfor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ducational service trade in China.

Keywords: Bilateral Educational Agreement; Study Abroad in China; Service Trade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